

主流经济学的 一种求索录

王泓远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序一

1962年，当王泓远教授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资本论》进修班毕业后开始《资本论》教学生涯之时，我由南昌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踏上了求学之路，学习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是《资本论》。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四十年。四十年来，王泓远教授笃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致力于以《资本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为我国高等学校《资本论》课程教学和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王泓远教授十分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结合江西乃至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发表真知灼见，提出很多独特的见解，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他师德高尚，学风严谨；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备受学界同仁仰慕。

《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求索录》这本著作，正如书名所言，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探索的一种记录。这本书记载了王泓远教授四十年治学的心得，是四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是四十年探求真理、与时俱进的见证。对于《资本论》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价值，人们是在对其不断地学习和研究中加深认识的。记得在复旦大学初读《资本论》时，正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理解“《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句话时，强调它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即《资本论》的重要性在于它全面地分析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实质，阐明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因而它是武装工人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人们对于剩

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倾注了满腔的热情。由于未能全面深入地理解《资本论》的丰富内容和价值，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的红卫兵断言：《资本论》讲的就是“造反有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人们对于《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所阐明的规律，有些属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有规律，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王泓远教授这本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对《资本论》乃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学习和研究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进程。

自《资本论》传入中国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研究《资本论》的著述数量成千上万，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各有特色。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像王泓远教授这样从多角度、多层次、以《资本论》为平台来研究中国经济的著作似乎是不多见的。其方法之独特，涉及面之广泛，见解之精辟，不失为一本创新之作。

作为王泓远教授的同事，多年来，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在不计其数的学术研讨或切磋学问的活动中，我从他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我主政江西财经大学工作以来，始终得到他和许多老教授的指导和支持。王泓远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因此，以上述文字表达我内心的感受，聊作序言，是为荣幸之至。



2002年7月30日

序二

三人之行，必有我师——泓远教授便是我敬重的师长；百人之间，必有我友——泓远教授便是我忘年之交的朋友。也正因为如此，在史忠良校长的倡议下，我精心策划、极力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汇集了王教授毕生研究成果的精华，以飨读者，更重要的是，它在传递着一种精神——尊重学术前辈，以示后人的精神。

我和泓远教授相识已有十年。他从江西大学经济学系主任位置退下来后继续在原经济学系执教，在我任系主任期间，我们真诚地聘请他为原经济学系顾问。他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坎坷的经历、谦逊的风格、幽默的谈吐、生动的授课、严谨的治学态度、与人为善的品德、东北人的豪爽、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甚至偶尔还常有返老还童的天真，时常感染着我们学院的每一位老师和学生。我为有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长辈和朋友而自豪和骄傲。

王泓远教授从事教育工作已四十二年。四十多年来，王泓远教授教学认真、治学严谨，开设的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同行的好评；在《资本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诸学科领域学术造诣深厚，科研成果丰硕，桃李满天下。王教授作为江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为江西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各种活动，为江西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王教授在我省学术界和政界的知名度很好，是我省资深经济学家之一，在全国

也颇有影响。在教学和科研之外，王教授作为我院前身原经济学系的顾问，为我院各项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为我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院号召全体教工向王泓远教授学习，学习他一辈子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优秀品质；学习他治学严谨、认真备课、博采众长、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为人谦逊、虚怀若谷、坦诚相待、团结同志、不计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学院要求全体教工以王泓远教授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开拓进取，为进一步办好经济学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学院为表彰王泓远教授的突出贡献，经2000年3月15日第八次院务会研究决定，在他退休之际特设立“泓远经济学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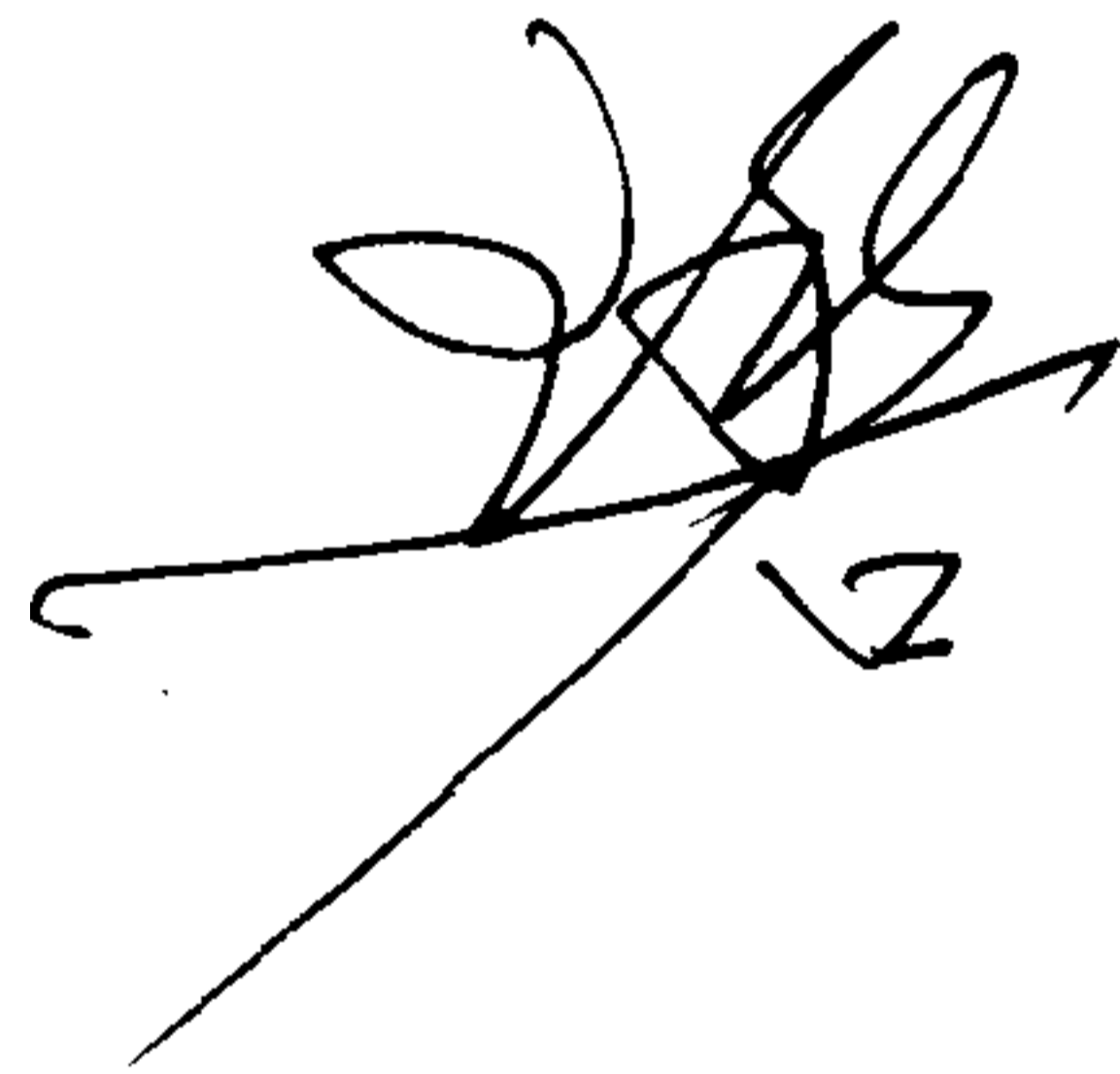
“泓远经济学讲座”为我院一年一度最高级别的学术讲座，我院每年邀请一名国内知名教授担任这一讲座的演讲人。

2000年“泓远经济学讲座”的演讲人为复旦大学张军教授，2001年的演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院顾问卫兴华教授。他们演讲的题目分别是《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2000年6月13日）、《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2001年4月30日）。正如张军教授所言，以个人名字冠以讲座，在国外学界比较多见，而在国内确属罕见。他甚至判断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可能是国内第一家。也正因为如此，张军教授在发表该文时就注明了首届“泓远经济学讲座”演讲稿。借此机会，我对张军教授和卫兴华教授的演讲深表谢意。

泓远教授在本书后记中提到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视同仁，毫无门户之见”等，这无疑有过誉之处，但这的确反映了我本人的学术追求。

在中国经济理论界，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因持不同的学

术观点遭到过严厉的批判。回首往事，我们从中可以汲取什么有益的教训呢？我们的理论胸怀不能太狭窄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敞开我们的理论胸怀，耐心地听取他人的研究，吸收他人的学术成果，尊重他人学术讨论的自由，容忍他人在学术上的错误呢？做人要宽怀待人；做学问，也要宽怀待学。笔者觉得，在中国，无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还是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只要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昌盛而努力研究的学者，都理应受到尊重和肯定。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有一个较好的理论氛围，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才能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everal overlapping loops and lines, positioned above the date.

2002年8月8日

绪 论

1962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资本论》进修班考试后拿到的吴玉章校长签发的《毕业文凭》（编号511），就成为我后来从事《资本论》教学研究的上岗证书。提起四十年来的经院式的注释和解说式的教学我真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才如梦初醒，逐渐体会到除了要坚持《资本论》的经济科学性质以外，还应该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视为一部“艺术”《资本论》、“圣经”《资本论》、“市场”《资本论》和“方法”《资本论》。

一、 艺 术

马克思在1837年就读于柏林大学时给他父亲写去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治学意向时说：“我打算埋头于科学和艺术。”此后，马克思尽管评论过歌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思想，评述过拉萨尔的《济金根》的剧作，并创作过悲剧《乌兰涅姆》、讽刺小说《斯考尔昂和菲力克斯》，还给燕妮写了三本诗集以及相当数量的叙述和嘲讽类的文学作品。然而，历史却选择了他并让他把毕生的主要精力和创作兴趣投入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堪称人世间的楷模。他们在创作《资本论》时彼此经常地激励、探讨和交流。他们的这种友谊和合作，从他们留下来的《资本论 书信集》中得到了印证，也从

他们410封来往书信中折射出先贤之间志同道合的真诚和永恒。在1815年，当马克思呕心沥血撰写的著作《资本论》即将出版问世时，他写信告诉挚友恩格斯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后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回信中再次说道：“你信中谈到‘艺术作品’的那部分我感到很有趣。”两位大师彼此如此呼应，很快就达到了创作思维上的共识，为创作一部艺术的《资本论》奠定了合作基础。后来，德国党内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梅林在《马克思传》一书中把《资本论》这一划时代的经济科学著作也视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艺术和科学都是认识、概括和表述真理的载体，都是追求和探索客观真理的途径和方式。科学的任务和使命是从纷繁复杂中寻找其统一性，从偶然性中寻找必然性和规律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明确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就是对科学任务的一个极好的佐证。作为艺术任务则是从无序中创造出有序，从不和谐中创造出和谐，从无形中吹造出有形。《资本论》既是一部不朽的科学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艺术著作。在马克思看来，形象思维同概念思维或抽象思维一样是认识、概括和表述大千世界的两种基本思维方式。我们经济学人曾经习惯于用左脑看待《资本论》，显然，我们还应急待开发右脑。用右脑看待《资本论》，即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艺术整体的观点，去深入认识《资本论》经济科学内在的真、善、美的艺术形式。二十年前即1982年，笔者试从《资本论》的科学叙述所蕴含的艺术思维中，以《谈谈 资本论 中的形象思维》（《江西大学学报》）为题挖掘马克思描绘资本主义世界的艺术形式，笔者发现：《资本论》科学中有艺术，艺术中有科学，而且两者互为联系、相互推动，就像圆形、椭圆形、三角形、抛物线形、曲线形或经济学上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等形式既是科

学又是艺术一样，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普遍的、深刻的、永恒的、精神上的享受，体现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双重目的。

转换一个视角，我们还会看到西方经济学著作也是讲究形象思维的。被西方经济学称做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一书中曾生动叙述过的经济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几乎被当代经济学界视为一部市场经济著作的活模特，经常会浮现在我们面前。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著名学者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上册的第一编《基本概念》即相当于我国经济学著作中的导言或导论，两位学者还特意绘制了一幅生动的动物素描图画，借以说明即使是同一个主体，当他用不同的眼光在观察同一客体的素描动物时，也会得出或是一群大鸟或是一群羚羊的不同结论。不难看出，这个不同结论再次表明经济科学的社会性和趋利性的学科特点，说明经济学实质上还是一门立场科学或角度科学。当过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经济学》中他用两个长方形、三个椭圆形和七条短线箭头组合成一幅市场经济的运行线路，将市场、厂商和家庭三大经济主体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或关系描绘出一幅简单、生动而深刻的市场理论蓝图。

有趣的是，斯密是用手、也有人是用脚来说明经济的。《当代财经》（2002年第3期）有位作者在评述股市时指出：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小股东的利益就有可能受到伤害。作为一种补偿机制，证券市场的存在为小股东们提供了“用脚投票”的机会。该刊有位学者著文指出：解决“泡沫化”的中国股市的出路在于突破“瓶颈”。有的学者主张改革要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割裂模式转换为系统模式。还有少数学者在文章中用驴、羊、猫、狗、狼等象形语言说明经济学问题。萨缪尔森在《经济学》著作的开篇写道：“经济学被称之为社会科学大王——是最

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上册，第2页），他并比喻说像骑驴的人用胡萝卜和大棒来驱使驴子前进一样，市场制度应该用利润和亏损来解决市场上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问题。有的学者把500强企业比喻为“领头羊”。还是那位萨缪尔森，他在分析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时尖锐地指出：一个富人的猫喝到的牛奶，也许正是一个穷人的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需的。有意思的是，他还用经济学教授的口吻说：经济学上的价值理论并不难懂，只要你记住：是狗尾巴摇动狗身子。摇动价值和数量这条狗身子是边际效用这条狗尾巴。我国有少数学者认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国门后“狼来了”。除此以外，许多经济学上的形象语言比比皆是：如“蛛网定理”、“逐鹿管理”、“橄榄型”或“洋葱型”结构、经济“哑铃型”或“树枝型”、农业“绿色政策”或“黄色政策”、“峰谷电价”，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在被我国一批著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推崇备至的美国学者曼昆的《经济学》中作者除了用深入浅出、简洁明快的叙述文体以外，还在书中插入了许多黑白照片、素描和漫画等艺术品来说明经济学上的若干原理。他用两幅超市和银行的照片，来反映经济人的全部收入最终将分为消费产品和储蓄投资，从而说明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对应关系；他还用一幅城市交通拥挤污染的照片，说明经济学如何运用市场机制以解决交通的拥挤和污染等棘手问题；他还用一幅飞机客舱中两位旅客交谈的素描，说明为什么飞机座位以许多不同价格出售的道理，以及每逢周六晚上的两个城市之间的往返票价一般较低的原因。更使人感到生动而深刻的是，他还用四幅连环画的美术形式说明美国政府对农场主补贴的公共政策上的弊端。在这些画面中，他描绘了白人农场主麦克同雇佣黑人卢福斯之间就补贴问题的对话。其中最后一幅是农场主麦克咧着大嘴乐陶陶地说：“我的国家真是补贴的美丽福地！！”看到这里，人们把曼昆的图文并茂的《经济学》

联想为一部《画说 经济学 》。这又有什么过分夸张的呢？

极为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在表述文体上做出了种种创新尝试，并得到了读者群体的一致好评。笔者有机会作为一部名著的编委，曾和21世纪出版社的编辑们在原江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兼江西省经济学会会长傅雨田的家里和我的家里先后进行过策划，后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主编、著名国画大师蔡超主笔创作出《画说 资本论 》（第1~4卷）。他们用喜闻乐见的卡通形式将博大精深的《资本论》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来。这无疑是普及《资本论》的一项创举和贡献。这既是一部艺术杰作，同时也是客观和真实地再现了《资本论》的科学著作。再次说明了经济学家与艺术家同样有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美只能是整体。《资本论》作为艺术整体，表现出三个既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主要艺术特色：这部传世之作——《资本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整体的意识形态，充分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总体意识、总体精神和总体愿望与要求，并从经济科学中再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整体思维力量。而马克思所概括反映的这种整体意识的文体是博大精深、结构完整、逻辑严密、完美无缺、自成体系的；从商品细胞到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浑然一体，集中体现了《资本论》总体的结构美。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另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从劳动与资本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中抽象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作为论述对象的主体。美的本质是美学探索的母题，是探求美学中其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的“劳动创造了美”的观点，指的就是工人主体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精美的物质产品，并在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中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在论述过程中，马克思高度颂扬了劳动经济人的真、善、美。同时，即使是揭示资本和

土地经济人的假、恶、丑时，他也严肃指出：“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这是因为，马克思所研究的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自然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他认为，一个人一生下来就会遇到现成的一定生产力、物质生产以及人和人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诸种关系。因此，在论及到这种关系时，不能让其载体者或承担者个人对这种关系负责。所以，他在《资本论》中戏称人格化了的资本和土地两种基本经济范畴为“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从而使市场舞台上的这些“先生”、“太太”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人格化有如抽象艺术一样，是体现了抽象的人格美的。

《资本论》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在阐述人和人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时，正如恩格斯强调指出的那样，它是通过物即商品联结起来并进行活动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资料商品都具有两重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作为经济学上的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为艺术美学上的商品则有物质性和艺术性。如今流行于世的云锦唐装和民族服饰，生猛海鲜等美味佳肴的色味香形，哥特式、巴洛克式和中国大屋顶式的各种风格建筑，驰骋于公路上的各款豪华轿车和古典汽车，以及各式各样的动物造型的闹钟、千奇百怪的儿童玩具和琳琅满目的手机、计算机等商品无不展示了人类特有的艺术天地。从现实商品到《资本论》上的观念商品不是同样体现出商品的形象美吗？

一般来说，一个人认识和把握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似易实难的，从模仿走向创作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创新过程。近几年，人们开始讲究原创性思维。为此，上海《文汇报》发表过一篇“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类比文章。我记得我是站在人行道上的贴报栏看到这篇文章的，所以，对文章的标题和作者已记不起来了，但对这一类比的内容还是记忆犹新的。文章讲的第一条狗叫是因

为它看到了人形后才叫起来，后边一些狗叫却不是因为它们看到了人而是听到了第一条狗的叫声也跟着叫起来了。可是，读罢，我心里又总觉得有一点人狗并论的异样味道。老实说，我是很难一下子做到原创性的。自发表《谈谈 资本论 中的形象思维》一文后，一晃十年时间我就再未用形象思维写出任何东西。1992年4月，为了参加武汉大学召开的长江开放开发理论研讨会，我以抽象、形象两种思维方式，结合江西省情、省力的实际，写出了一篇《“干”字型战略设想》的发言梗概，后来经过整理写出了《“干”字型市场经济运行载体模式——对江西走向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一种结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文章开头以“形象·主题·模式”为引题写道：

“本质是现象的。从沙粒到地球，从细胞到机体都是有形有体的。人们对于这一形体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概括，往往在运用抽象思维的同时还使用形象思维来再现、模拟和表述这种思维成果。所以，形象思维同抽象思维一样都是人们认识大千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学术界当今流行的公理方法、形式化方法和模拟方法都是具有一般性的方法。这些方法已在逻辑学和数学上得到了共识和发展。在经济科学中，人们以前对于这些方法，总有一种形式刻板、单调乏味的感觉，后来顿悟到，这些方法好像与我们汉文化有着特殊的历史机缘。汉语的基础是象形文字，起初表义方法是通过汉语的形体与事物的形体的相似性，使事物的形体同事物的意义发生了因果关系，从而使事物的本质形象化、形式化了。

不难看出，事物形象化实际上也是一种本质化、结构化。按照系统论的自体认识，结构无非是系统内部的各种因素、成分和规定的排列方式或组合方式。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主题‘干’字型的**第一笔是长江南岸的江西沿线，即从瑞昌市猴儿咀—九江市—彭泽县牛矶；第二笔是浙赣铁路的江西线，即从老关镇—萍

乡市—南昌市—上饶市—老镇镇以及与此相并而行的320国道的江西路线；第三笔则是江西境内的三条路线，即向西—九江铁路线，105国道和纵贯江西南北的赣江航线，以及京—九（即九江）—九（即九龙）铁路线。上述线路的分解和组合便构成了本文的主要思路和表述方式。”

尽管笔者对艺术有较浓厚的兴趣，开始重视形象思维，并以抽象和形象两种思维方法写出了《谈谈“资本论”中的形象思维》、参编了《画说“资本论”》，还研制了“干”字型江西市场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然而，我知道，我的知识结构缺陷，艺术视野和审美水准的狭窄和浅薄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上述作品只能说是“艺海拾贝”，在经济科学领域内的形象思维艺海中所做的一种初步的、肤浅的尝试而已。但我确信，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只有与它的艺术繁荣程度相适应，抽象思维发展程度与形象思维发展程度相适应时，才能更好地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二十年前，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大诗人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工作会上曾语重心长地呼唤，使我们至今难以忘却。他说：“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二、 圣 经

在世界文明历史上，曾因为割据和封闭在西方形成了一种流

俗的偏见，即一切知识来自于希腊，一切信仰来自于上帝。作为信仰的“圣经”，犹太民族是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他们先后写出了两部流芳百世、影响深远的“圣经”，即一部是宗教《圣经》，另一部则是科学“圣经”——由犹太人卡尔·马克思（1818～1883）创作的《资本论》而被他的挚友恩格斯推崇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一般说来，宗教通常应具备历史、仪式、组织和经典四大基本因素。然而，贯穿于这四大基本因素之中的精髓不是别的，而是相信或信仰二字，即相信宗教或信仰宗教。作为宗教《圣经》“自诞生以来”，教皇、神父和学者不断地进行阐释、解说和考证，留下了浩繁的各种历史文献，其核心是一个信不信和灵不灵的问题。当代西方有两位学者著书立说阐释“圣经”的宗旨就是这样：一位美国著名学者亨德里克·房龙在《圣经的故事》中开篇第一章以《一部文学的遗产》的文学视角描述了“圣经”，塑造了约瑟、耶稣、大卫、所罗门等一批人物的慈悲众生的高大形象。另一位是英国学者戴维·罗尔在他的《时间的检验》一书中则以历史角度探索了“圣经”的起源，证明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和伊甸园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确凿史实。不难看出，两位学者的用心无非是一个想用文学感染人们去信仰“圣经”，另一个想用考古学说服人们去相信“圣经”。我在这里试以信仰的传播方式来比较两部“圣经”的异同。尽管当今学术界盛行于比较研究，如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文学等比较研究作品层出不穷。然而，我却始终认为，宗教《圣经》和科学“圣经”在内容和目的上是无法比较的。我之所以对两部流行于世的“圣经”做一比较尝试意在探索如何“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一）两种不同“圣经”的历史起源

历史上的宗教“圣经”一词最早是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通在4世纪首创的，指的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其中《旧约》讲的是一个阿拉伯沙漠部落的故事，描述

亚伯拉罕、摩西等人领导犹太民族经历漫长的漂泊流浪生活之后，终于在西亚的一小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并创建了自己的国家。

《新约》则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拿撒勒镇上的木匠即耶稣展开的。故事说犹太人约瑟的妻子玛利亚生了个儿子，他们自己人管他叫耶和華，他们的邻居希腊人则称他为耶稣。既然耶稣是人，是被他的信徒奉为神的，而19世纪一些自由思想家又把他还原为人。所以，作为无神论者我愿在这里以人格化来评述耶稣。房龙说“圣经”故事是这样编辑出来的，从犹太人的每个小村庄、小神庙的一些传抄记载，并由长老汇集整理后把它们写在兽皮、金属片或埃及草纸上。到了公元1世纪，这些记载才转译成为希腊文，后来又被译成各种文字传播。《旧约》就是这样传承的。《新约》因受罗马帝国当局的迫害也只能暗地传抄，最后谁也弄不清楚哪些传抄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了。经数百年后，教会为了正本清源，召集了一批学者，经过筛选编辑，只保留了几部福音书和信徒们的几封信。直到基督死后七百余年后，东西方教会才算达成了共识，决定使用现在流行的《新约》。

马克思的《资本论》写的可不是犹太人沙漠部落和一个木匠的故事，而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故事，是15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尤其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和劳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斗争故事。他毕生写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和发展的革命故事。在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解放运动中，马克思始终是同情、热爱和声援中国的。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优秀民族。当他知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知道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时，便奋笔疾书，鞭笞侵略者。马克思可能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缘分。有一次，他三个女儿给马克思出了20个自白式的题目让他表态，其中问到您喜爱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时，马克思果断地回答说：黑色。他也憧憬着中国传统文化并在家书中戏称女儿

们为中国“皇帝”，大女儿燕妮为“中国皇帝奎奎”，小女儿爱琳娜为“中国王子古古”。在《资本论》中他还多次讲到中国，讲到中国劳苦工人，还讲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奏折改革货币及其遭遇等问题。

“工人阶级的‘圣经’”成书是历尽千辛万苦、遭受了人间种种磨难的。马克思一生始终是在政治迫害、经济贫困、疾病缠身和工作繁重的条件下进行创作《资本论》的。他的刚毅、激进和坦诚性格和他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因而遭到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联合迫害和驱逐，使他不得不从德国到法国又到比利时，再辗转去法国和德国，最后被迫流亡到英国而定居于伦敦。他一生只有一种革命职业，从来没有稳固的经济收入，即便他一度给美国《每日先驱论坛报》打工，每两周写一篇社论，但由于报社老板常常拖欠和无端克扣稿费，结果所剩无几。一家人经常为房租、面包等生活资料商品犯愁，有时马克思为了躲避房东讨债不得不整天逗留在伦敦街头。当他经过十五年潜心研究出来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寄到德国去出版时，发现自己已是身无分文，不得不急忙地给恩格斯写信求援才得以寄去出版。

笔者去年在上海图书馆翻到一本书说，马克思在荷兰曾有一个姨父菲力蒲斯是个有名的银行家和电器制造厂老板。马克思的女儿有一天在同他父亲的姨父的孩子闲聊时，小菲力蒲斯得意洋洋地卖弄说：你们家好谈论资本，而我们家却去赚资本。有一次，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感慨地说：世界上写货币的人恐怕只有我这个写货币人没有货币。确实如此，马克思正是在缺少商品、货币和资本而专门去写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人。我知道，我还不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孝子，但当我握笔写到这里时，内心却有着无限的思念和联想。贫病是交加的，马克思常常带病坚持写作《资本论》，有时捂着隐痛的肝区去写，有时揉揉视线